

隨筆・觀察

說 胡

• 胡文輝

小時總覺得姓胡很不好，因為「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胡說、胡扯、胡言亂語、糊塗、狐狸和猢猻之類不大好聽的詞。更難為情的是，總有人在我面前提起那些姓胡的「反動派」——最臭名昭著的，當然是樣板戲《沙家浜》中的偽軍司令胡傳魁和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地主惡霸胡漢三。另外，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還有一個許大馬棒的飼馬副官名叫胡標（在原作《林海雪原》中本作「胡彪」——可能是為了避林彪之諱才改為「標」！），楊子榮就是假冒胡標之名打入土匪窩的。胡漢三帶着「還鄉團」回來反攻倒算時所說的那句名言更是一再被引用：「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奇怪，為什麼文藝作品中的壞人會姓胡？或者說，為什麼胡成了壞人的姓？

我猜想這並非事出偶然，而是有些歷史背景的。大陸50年代有兩場以個人為批判對象的政治運動，一場是批判胡適的（「胡適批判」其實進行了兩次，一是1951年底的「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二是1954年底由「《紅樓夢》事件」所引發的正式批

判），另一場則批判胡風（1955年）。由於胡適在現代中國文化界的巨大影響，「戰鬥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胡適被當時文藝界的權威人物周揚定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①。胡風則是因為堅持自由化的文藝思想（儘管也是左翼的文藝思想），而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藝方針相衝突，並且「犯顏直諫」，最終被打成「反革命」。這兩場「批胡」運動時間相近，所以在當時經常被相提並論，如〈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955年1月20日）中說：

……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適的同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的批判。

又〈關於在幹部和知識份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講演工作的通知〉（1955年1月26日）也說：

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

批判「二胡」的運動聲勢浩大，影響深遠。一位學者總結說：「胡適批倒，緊接着的胡風捉拿，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裏的人更是噤若寒蟬，談『胡』色變。」^②我想，正是因為這個「談『胡』色變」，從此「胡」便成了惡姓——於是文藝作品中的大奸大惡就被有意無意地寫成姓胡了！

這種將姓氏善惡化的邏輯，現在看來可能有些不可思議，但在當年卻完全是理所當然的。從50年代到8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間，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社會，其特徵是意識形態與政治融鑄為一，對社會生活進行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的全能控制，使社會的所有領域都意識形態化（政治化）。而作為意識形態媒介的語言文字更是首當其衝，徹底地被改造為一種革命化的語文。其中就連小小的姓名，也成為一種「政治符號」，籠罩着意識形態的巨大陰影。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時事為名字，如抗美、援朝、念林（紀念斯大林）、鳴放、躍進、三反、四清、超英（15年超過英國）、文革等等。文革期間更是登峰造極，名字簡直成了標語和口號，如永紅、衛東、學東、衛彪、學青、學軍等等^③。更具體的例子，如本地有位挺活躍的女寫手（不將她稱為「作家」，倒不是覺得她夠不上作家的水平，而是各自為伍的意思）真名叫黃愛東，當然是「熱愛毛澤東」之意，這個名字顯然太直露庸俗，所以她的筆名在真名後增添了一個字，叫「黃愛東西」，這就真可說是化腐朽為神奇了，而且還一不小心便開啟了以四字為筆名的時尚。

上面說的還只是起名，更極端的還會改名。不少女性原以蘭、芳、娜、媛等等為名，因為太富於資產階

級情調，文革初期紛紛改名。還聽說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有人原叫××西，文革時期卻一下子來個180度大轉彎，改名××東！這其實也是順理成章的，「西」代表西方反動的資本主義和罪惡的帝國主義，而「東」代表東方革命的社會主義（而且毛澤東也叫「東」）！毛主席曾說：「現在世界形勢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他又怎麼能名叫「西」——而賣身投靠反革命的西方呢？！

這種將姓名貼上善惡標籤的心理，在我們中國其實是古已有之的，只不過於今尤烈而已。宋代的丞相秦檜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漢奸」，據說他的後代曾寫過一首詩：「人云我生貴，我云不如貧。只因祖宗壞，恨我愧姓秦。」（這首詩文字淺白，不合平仄，說不定是近人偽托）還有一副很出名的對聯：「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

因為秦檜，秦成了惡姓；同樣，因為胡適和胡風，胡也成了惡姓。由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何以胡傳魁、胡漢三、胡標會與胡適、胡風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當然，我小時自卑於胡姓的那種「姓氏情結」早已煙消雲散，別人跟我開玩笑，我自然只是一笑置之。因為姓氏只代表一種先天的血緣傳承，而與後天的個人品質無關，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姓秦或姓胡，固然不足貴，但又何足羞？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全世界人民是一家，那時說不定連姓氏都可以取消呢！何況，當年被視為反動派的胡適已得到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的重新評價，胡風更是早已獲得平反昭雪：我還發現武俠小說中姓胡的多是英雄人物，如胡一刀和胡斐父子（金庸《雪山飛狐》、《飛狐外傳》）、胡逸之（金庸《鹿鼎記》）、胡鐵

花(古龍《楚留香傳奇》)等等。所以姓胡的倒是應當不以為恥，而反以為榮！

「胡」除了用作姓氏以外，在古代最普通的意義大約是指北方的異族，胡漢之分，亦猶夷夏之別。這有一個很著名的歷史故事：傳說秦代有個方士盧生，曾向秦始皇獻上圖讖云：「亡秦者胡也。」自然，誰都會將這個「胡」理解成是當時在北方侵凌漢地的匈奴。於是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率軍三十萬北擊匈奴，並築成聞名後世的萬里長城。可是大家都知道，秦最後卻無法逃避滅亡的命運，而且是二世而亡——秦亡於秦二世胡亥之手。「亡秦者胡也」的「胡」不是指匈奴，而是指胡亥！當然，「亡秦者胡也」這一預言的實現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而無疑是出於後人的偽托。但這個偽托的預言卻暗示了一種深刻的史識：一個帝國的滅亡，並非由於外來的打擊，而是由於內部的自我崩潰！這一史識就與現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結論不謀而合了。湯因比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中說：「在過去許多文明曾經遭遇到的破壞，從來不是由於甚麼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而恰恰一直是一種自殺性行為的結果。」「外部敵人的最大作用只是能在一個社會自殺而沒有斷氣的時候，給它最後一擊。」^④

後來，「胡」由指北方異族這一意義引伸，又泛指來自西方的各類人種，南亞(印度)、西亞(波斯)和歐洲等地的人都可以稱為「胡」。因為古代中國的文明遠遠領先於鄰近地區，中國人自然很有文化優越感，對外來民族不免會有些「種族歧視」，所以「胡」字多多少少帶些貶義。比如傳說開創了中國禪宗一系的印度人達摩，就曾被後來呵佛罵祖的禪宗教眾輕蔑地稱呼作「胡子」、「老胡」，甚至「老臊

胡」、「缺齒老胡」^⑤。大約正是由於「胡」這一稱呼有歧視的成分，所以後來「胡」便漸漸有了胡亂的意思，於是才會出現胡說、胡白、胡柴(胡白、胡柴也是胡說之意)、胡言亂語之類的貶義詞。還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陳寅恪曾寫過一篇〈狐臭與胡臭〉^⑥，認為「狐臭」本來應當寫作「胡臭」——因為外國人體味較重，所以就乾脆將狐臭這種毛病稱為「胡臭」！

又因為「胡」有胡亂的意思，便使作為姓氏的「胡」很容易與之發生語義糾葛，從而弄出笑話來。有一則關於胡適的笑話就很流行：胡適在一次演講中，就某個問題向聽眾介紹了孔子、孟子和孫中山的有關學說，並分別在黑板上寫着：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在黑板上寫着——胡說。

註釋

- ① 周揚：〈我們必須戰鬥〉，載《光明日報》，1954年12月10日。
- ② 胡明：〈胡適批判的反思〉，《二十一世紀》，總8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1.12)，頁54。
- ③ 例子主要引自楊東平：《城市季風》(東方出版社，1994)，頁267。
- ④ 湯因比：《歷史研究》，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223、36。
- ⑤ 參見袁賓主編：《禪宗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⑥ 載《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胡文輝 1967年生於廣州，1989年肄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現為廣州羊城晚報初級編輯。